

郑观应传 夏东元著

三三一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

充实郑观应研究的一本著作

乔 还 田

郑观应是我国早期有影响的实业家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曾经风靡一时，并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史学界以往对他的研究大都侧重于探讨他的思想，对其企业活动仅是附带略述而已。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则弥补了这一欠缺。

这部传记系统地概述了郑观应从出生到病逝的主要经历，特别是对他办企业的活动及其维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的论述。郑观应正是通过经营工商业和其他社会活动，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概括地说，就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就表明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核心是“富强救国”，而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则是达到“富强救国”目的的两根杠杆。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胚胎”，因此，“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科学家。”

作者在论说郑观应的活动和思想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囿成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过去所有论者几乎一致断言郑氏的“商战”思想贯穿着一种近乎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倾向，其着眼点在商品的贸易流通过程，而不是在生产过程。本书作者则认为这种说法是经不

起推敲的。因为郑观应讲“商战”非常强调要操胜算，他意识到在税收等与外洋平等的条件下，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是胜负的关键。这种视工业为商务之本的思想到一九〇〇年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还特别论证了郑氏心目中“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说郑观应虽曾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但却不能据此断言他不重视“兵战”。事实上，他也希望中国有强兵，不过他从不孤立地谈强兵。他把强兵概括为“人”和“器”两个因素，说“人”的优秀在于教育，“器”的锐利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只有近代工商业发展了，才能致富，军队才会有自造的精良装备。他竭力主张把自强的基点放在发展近代工商业上，放在“商战”上。

有的论者认为郑观应提倡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是一种错误观念，它在理论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本书作者则认为郑观应的“体”、“用”，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洋务派所讲的西学，仅仅是所谓格致技艺之学，中学就是孔孟之道。而郑观应的西学是包括政治和科技两方面的内容，不仅应求其用，也要学其体。他的“中学”也不仅仅指的是孔孟之道，而是还包含有议院制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内容。

关于郑观应政治主张的评价，过去人们都分为甲午战争前后两个时期。对甲午战前的主张往往予以肯定，对甲午战后的主张则加以贬斥。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一八九五年新

刊十四卷本《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不但将《议院》篇放在次要地位，而且还把一八九四年五卷本中最激烈的“而犹谓中国尚不可亟行哉？噫，质矣”删去，改为“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学校人才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二是到一九〇〇年，他出尔反尔，提出马上实行立宪，其用意是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本书作者则指出一八九五年郑氏的政治要求所以变的那么缓和，一方面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减轻维新运动的阻力暂时不把议院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修改的不一定代表郑氏的真实思想。至于一九〇〇年提出马上实行立宪，虽有其对付义和团运动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

二、加强了对某些薄弱环节的研究。

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能反映这个过程的是他所著的从《救时揭要》，经《易言》，到《盛世危言》。而其中最重要的《盛世危言》却有许多不同版本。这些版本，有的是经过郑观应手定的，有的则是书商们未经郑氏同意删改的。对此，人们未曾作过认真的清理。本书作者考订了二十种不同版本（见书末《盛世危言》版本简表），从而断定一八九四年刊行的五卷本、一八九五年刊行的增订新编十四卷本、一九〇〇年刊行的增订新编八卷本系郑氏手定，可代表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而其他版本，皆不能反映郑观应维新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至于说郑观应研究中的其他薄弱环节，从目前情况看来，恐怕对其企业活动的探讨最显不足。本书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对郑观应的企业活动作的介绍和分析，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

三、注意了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

本书以史料的引用丰富和精细鉴别、分析见长。作者的许多观点，如前所提到的对“商

战”、“体用”思想等的分析评价，都是言之有据的。作者在论述郑观应在甲午、戊戌、庚子等事变的表现和重要办企业的活动时，所采用的材料，多是一些郑氏本人和他人的未刊信函。粗略统计，全书所采用的未刊档案材料占所引材料的三分之一以上。

四、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时代与人物的关系。

本书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随时留心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例如，作者在分析郑氏“富强救国”思想形成时，就很注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对其的刺激作用乃至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通过本书既能窥见郑观应一生的全貌，还能从一些侧面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变化的状况。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在个别问题上对郑观应似有“偏爱”的倾向，较明显的是论及郑氏的对外主张时，多强调他抗争的一面，而对其弱点却着笔不力。

前面已提到作者视郑观应把君主立宪和学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是一种新见解。而作者进一步认为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则是值得商讨的。首先，这种提法在本书未得到应有的论证。其次，从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含义来看，与郑观应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它的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一种政治要求，二是指“个性解放”。至于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其含义主要是指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郑观应的民主思想仅是指通过君主立宪来“通上下之情”以“振工商”；他的科学思想不外是“器械、铁路、电报等事”。可见，把两种差异很大的思想，用所谓“胚胎”的说法加以联系，是不贴切的。